

第九章 結 論

尚賢政治之萌芽及其發展，是先秦古史中極值得注意之一現象。尚賢政治思想之創發及其博成理論體系，亦爲先秦思想史中頗饒興味之問題。春秋戰國五百年間，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政治兩者間交互作用、相輔相成之過程，又爲吾國古代歷史發展之一大主流。爲對此一歷史現象作一探討，本書第一章曾提出如下三個問題：

一、造成春秋戰國時代實施尚賢政治之原因何在？其實施之情形如何？

二、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思想之內容如何？其與實際政治之間具有若何之關係？

三、尚賢政治之施行對春秋戰國變局有若何之影響？

本書第二章所回答的是第一個問題的前半部；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及第七章，所回答的是第一個問題的後半部；第三章第二節、第五章及第六章則係對第二個問題提出解答；第八章則對第三個問題提出了答案。

周代封建築基於宗法之上，其基本精神在親親，親緣關係支配一切政治社會經濟活動。然自平王東遷以後，隨着封建制度之瓦解而來者乃是親親精神之崩潰。由於王綱不振、王命不行，各國競相發展實力，官僚制度逐漸建立。在這種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巨變的背景之下，乃產生了春秋戰國時代之

尚賢政治與尚賢思想。從史實看來，尚賢政治之實施與尚賢思想之流變兩者之間實具有交相影響之關係，前者加了後者的出現，而後者則對前者產生了刺激之用。

春秋時代之尚賢政治首見於齊國，其次依序爲晉、鄭、楚等國；其發展與國際局勢之推移頗有密切之關係，大致可以魯僖公在位期間（659-637 B.C.）作爲劃界之分水嶺。在此之前，國際政治重心在齊國，尚賢政治之推行亦以齊國最力；在此之後，則國際政治重心在晉國，尚賢政治之實施亦以晉最積極。魯僖公以後，楚力圖北上問鼎中原，亦逐漸實行尚賢政治。故尚賢政治之成爲歷史主流，其遠因固須溯及西周封建制度之瓦解、官僚制度之逐漸形成，然其直接受國際爭衡之刺激者正不在少。綜觀春秋時代尚賢政治之實施，當以春秋中期魯宣公、成公以後較爲積極，尤其是襄公、昭公的時代最爲顯著。

再從春秋時代尚賢之史實看來，顯然可以發現，春秋時代所實施之尚賢政治所受局限仍大。大致說來，在尚賢政治之下所起用的人才仍多半來自於貴族或世家集團。尤其是在春秋早期，平民階級之優秀份子上升之機會仍小；春秋中、晚期以後，社會變動更趨激烈，尚賢政治之實施轉趨積極，起自布衣之賢才乃活躍於歷史舞臺上。

春秋時代之尚賢思想當以孔子、子產等人最著，就中尤以孔子首倡有教無類之旨，開創平民教育之先河，不僅對尚賢理論之搏成爲功厥偉，對尚賢政治之實施亦助益頗大。整個春秋時代就尚賢政治之實際而言，其借助於教育之功者實多；就尚賢政治之理論而言，則其與人治主義之政治思想實息息

相關。春秋諸子對尚賢政治之擁護，實根源於其對賢人之信心，此殆爲先秦諸子思想中一共同特徵。但從孔子、子產等人之尚賢思想看來，很明顯地可以發現，他們仍遊移於親親與尚賢之間，面對這兩極端作一己之抉擇，而不免顯現折中論或調和論之色彩。這種現象殆由於其所處變遷中的時代背景所使然。

尚賢政治至戰國時代進展甚速，此與戰國羣雄之競相發展實力有關。戰國七雄皆思成其畢六王、一四海之偉業，其推行尚賢政治不遺餘力之主要原因在此。戰國尚賢政治之發展，大致與戰國國勢之推移互爲表裡。魏文侯禮賢下士，首開戰國尚賢之風；其次則爲齊國；復次則爲秦國及趙國。

戰國諸子之尚賢理論以墨、荀二子最成體系、最富組織，墨子尤燦然可觀，實爲先秦尚賢思想之極致。孟子秉承孔子人治主義之餘緒，亦揭尚賢之旨。法家諸子重制度而略人事，尚法治而輕人治，故主張進才幹之賢人而退成德之處士；並主張以法、術、勢制約賢人政治。老莊崇尚自然，鄙視造作，以人爲爲桎梏，以尚賢爲亂源，首揭不尚賢，使民不爭之旨，是爲尚賢思想之反動。「方內」、「方外」固有所不同，〔註〕但是，由於當時整個歷史潮流大勢之所趨在尚賢不在親親，其勢殆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因此，老、莊對賢人政治之反對，對當時之尚賢政治未能造成強有力之沖刷作用，可視爲對當時盛行的賢人政治一種永恆之抗議。

綜觀春秋戰國之世，尚賢政治之實施，仍有其困難與差距，此殆由於人事及制度之因素有以致之。就前者言，人臣之私心、國君之才具、君臣之遇合、國君尚賢之誠意以及貴族之反對等皆爲決定性

之關鍵；後者說，社會結構、濟狀況以及文化傳統皆是具有影響力之因素。泯滅此一困難之良方殆在於知識與政治權力之結合，亦即政權接受知識之指導，此點殆為先秦諸子之所共見，亦為先秦政治家所共同努力以赴之目標。

尚賢政治之實施對春秋戰國之變局亦造成甚為可觀之影響。就經濟方面言之：尚賢政治之實施加強土地私有化之趨勢，加速瓦解了封建社會之經濟基礎；就政治方面言之：尚賢政治實加速了封建制度之崩潰與官僚制度之建立；就社會方面言之：尚賢政治之推行，引起了社會流動性之激增，也引起了君臣關係之改變；就思想方面言之：尚賢政治之實施造成若干觀念的普遍化，其最顯而易見者有二：一是個人才能較其血緣或親緣背景重要之觀念，一是士人之間逐漸發展之羣體意識；在教育方面：尚賢政治的實施則直接加速平民教育之發展，刺激士人求學之動機，在文化方面 春秋戰國時代的尚賢政治對中國古代各地域文化之融合實有推波助瀾之功，其影響於春秋戰國五百年之變局者可謂至深且鉅。

本書序論指出，先秦時代尚賢政治之發展象徵國史上政治活動理性化之萌芽，代表吾國文化演進過程中之一重要成就。秦漢以降，用人之法雖屢有變遷，然不論漢代之鄉舉里選，魏晉之九品官人，乃至隋、唐以降之科舉取士，雖制度遞遷，瑕瑜互見，然其根源於先秦時代賢人政治之崇高理想則殊無二致。惟此一崇尚理想之進展與秦漢以降國史之發展有其差距在。按先秦諸子尚賢論中之「賢」字有二義：一日德行之賢；一日才能之賢。孔孟所重在前者，荀子所重在後者，墨子則合而言之。揆諸

先秦尚賢政治之實際雖多取才幹之賢人，然對道德之賢人亦優禮有加。然自秦人畢六王、一四海，大帝國之局面形成，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之思想大興。「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中庸，第二十八章）自此道德與政治合流，皇帝非僅爲政治之領袖，亦爲道德之權威。德行之賢人遂失其現實之憑依，世之所重者惟才幹之賢人而已。漢人屢言「任賢使能」〔註二〕，然其所重在才幹而不在道德，尚賢政治中此種才幹與道德分野之趨勢爲國史演進中極堪注意之歷史現象，凌夷至於魏晉時代乃有所謂：「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註三〕，「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註四〕之見解，此不僅有違孔門合德行與政事爲一之理想，亦非先秦尚賢政治之初意。馴至歷代科舉取士之制度流爲帝王控制士人之工具，以天下爲已任者不必自此中出。讀史至此，能不沉痛於其間乎？

註 釋

註一：南華真經，卷三，大宗師第六，頁五八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此處用「方內」喻孔、墨，以「方外」喻老、莊。孔、孟所成就者乃道德自我之建立，老、莊所展現者乃充實藝術精神之世界。

註二：武帝初即位，即招賢良文學士；元光五年，復召賢良文學。公孫弘對策，以「因能任官則分職治」爲要務。見：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光緒二十六年長沙虛受堂本），卷五十八，公孫弘傳，頁二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同上，卷九，元帝紀，頁七下。並參考：江村治樹，「『賢』の觀念より見たる西漢官僚の一性格」，東洋史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二號；又氏著，「西漢官僚における『賢』と『能』」，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第四（九七六），頁三七——五三，特別是頁四一——四五。

註三：三國志補註（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魏志卷一，武帝紀，卷一，頁二十八上。
註四：同上書，卷一，頁三十九下。